



复礼、为仁、君子----孔子思想的三个支撑点

(2005-6-30 9:24:24)

作者：周山

孔子用直与不直作为尺子，衡量一个人距离“仁”的远近的思想，上承《周易》，也与老聃的思想有关系。《周易·坤》六二爻辞：“直、方、大，不习无不利。”认为具备了直率、方正、宽容这三种品质，即便不用学习也能畅通无滞。在这三种品质中，直居首位，可见“直”于人的道德修养何等重要。“刚毅”之所以能“近仁”，是因为无私欲；若有私欲，如其学生申振，“焉得刚？”这一思想，又与老聃的“无欲则刚”思想完全一致。“巧言令色”为可耻，也与老聃的“善言不信”之意相似。这种相同或相似，是他们能走到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。

2、“为仁”的方法。

孔子谈“仁”，最多的是关于“为仁”的方法。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譬式推理，即由已知类推未知的方法，是夏华思维的主要方法。“为仁”，也理所当然要采用“譬”式方法；取譬的材料，是从最近处着手；最近处是什么？是自己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（27）立，树立，指立业，所谓“三十而立”之“立”；达，达到，指某一目标的实现。意思是，自己想立的业，也帮助别人立；自己想达到的目标，也帮助别人达到。这种推己及人的胸怀，便是仁人的胸怀。按照这一胸怀去行事，就是“为仁”。当然，这种以己所欲推及他人所欲，并帮助他人实现所欲的“为仁”，会受到个人能力的局限，亦即一个人的“为仁”能力，总是有限的。子贡曾问孔子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意思是，如果能够广泛地周济民众，是否就是仁人？孔子告诉他：“尧舜其犹病诸！”（28）意思是，广泛周济民众的事情，连尧、舜这样的圣人都做不到。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；“为仁”之事，只能由近及远，一个一个地去做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

帮助他人仁，不强加人也是为仁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是孔子经常向学生讲的一句话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’”孔子这一番话的核心，就是要仲弓尊重别人。自己不想得到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如果说“如见大宾”、“如承大祭”还是表现形式，那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便是实实在在的内容。“无怨”，就是“为仁”的结果。子贡问老师，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生奉行的？孔子便告诉他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一次，孔子不仅讲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而且将这一句话的意思进一步作了概括，提炼为一个字：“恕”。能够推己及人，必有宽佑他人之心，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即“仁”的境界。如果终身奉行“恕”，自然就是一位仁人。

但是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境界既不是人人都能达到，也不是一个人未经磨砺就能达到。大概是在子贡拜师的早期，也曾向老师谈论过这个问题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。孔子则告诉他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（29）意思是，这种“仁”的境界，你还没有能力达到。

所以，由近及远的“为仁”方法，包括向身边的人学习，从切近的事情中磨砺自己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便是孔子的一个形象譬喻。向谁学习、如何磨砺呢？孔子向问“为仁”之方的子贡细道：“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（30）事奉大夫中的贤者，与士中的仁人交朋友，自觉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，目的在“善其事”，这个“事”，就是“为仁”。

有了“为仁”的方法，便要实践“为仁”的内容。孔子曾告诉学生子张，怎样才能达到“仁”的境界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恭敬，不会招致耻辱；宽厚，便能获得众人拥护；诚实，便能获得别人的信任；敏捷，做事便能成功；慈惠，便能获得别人的鼎力相助。子张是一位勇武之人，孔子针对他的具体情况，因材施教，希望他从五个方面作“为仁”的实践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”，（31）成为一个仁人。

从切近处着手的“为仁”方法和“为仁”内容，上升到“礼”的高度，便是“克己复礼”。“克己”的“克”，不是压抑，而是去除；“克己”的“己”，不是自己的所有欲念，而是“非礼”即不符合礼的欲念。所以，孔子在颜渊追问“为仁”的要目时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联系孔子肯定父为子隐、子为父隐的合理性，可以看到他是把人的欲念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不违礼的合情合理的欲念，这种欲念不但不能“克”，而且

要如实表达出来；不表达这种真情，反而远离了“仁”。另一部分是“非礼”的欲念，这类欲念必须“克”；只有“克”掉这些欲念，才能成为仁人。去除“非礼”之欲的过程，也就是“为仁”的过程。所以，当学生原宪（子思）问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时，孔子告诉他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（32）意思是，能克制住好胜、自矜、忿恨、贪欲，使之不表现出来，已经很难能可贵；这是否算达到了仁，就不知道了。孔子为什么“不知”，原因就在“不行”与“克”有区别，“不行”是制住不让表现，“克”则是去除。只有去除，才能真正“为仁”，才能“天下归仁”，被人们认可。

3、“为仁”的作用。孔子是一位入世意识很强的学者。他强调“为仁”，自然要说明其实际作用。“为仁”的作用，首先是有益于社会的稳定。社会能否稳定，取决于能否“复礼”。面对一个不想“为仁”也很难能够“为仁”的人，跟他讲礼乐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礼乐对于这种人也失去了任何约束力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33）

“为仁”的第二作用，是能够爱人。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’。”（34）这是孔子讲“仁”的话语中最简明扼要的一次。爱人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，是一种表里一致的行为，仁者爱人，爱谁？孔子要求学生“泛爱众”（35），即广泛爱大众，而这“泛爱众”的仁心，首先要落实在自己的亲人和自己周围的人身上。例如对父母的爱，不仅是要落实在奉养他们，而且要始终对他们和颜悦色，让他们真正能感觉到儿子对父母关爱的温暖。父母死后，子女要守孝三年，以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。学生宰我（宰予）认为守孝时间太长，应改为一年，并列出一大堆理由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听了宰我这一番话，孔子很愤慨：“予之不仁也！”不仁的原因，是宰我没有“三年之爱于其父母。”（36）除了爱父母，仁人还能关爱周围的其他人。有一件事，反映了孔子仁者爱人的胸怀：“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（37）他并非不爱马，而是更爱人。

孔子的仁者爱人，虽有“泛爱众”之说，但也不是无原则的爱人，更不是爱所有的人。他的爱是有原则的爱，如同他的恨人，也是有原则的恨。所以，“为仁”的另一个作用，是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爱人和恨人。而且在孔子看来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（38）孔子讲“仁”，不仅讲“爱”，也讲“恶”。有原则的爱是“仁”，有原则的“恶”同样是“仁”。这一点，实为孔子思想的精彩之处，《论语》中着墨不多，我们却不应忽视。

三、君子：儒者的人格培养

仁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，所以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人。孔子曾当面说他的学生子贡不具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“为仁”能力。因此，在“仁人”之下，有一个“君子”的席位。“君子”的对立面是“小人”。在君子与小人之间，还有一个不好不坏、时好时坏而又数量最多的平常人。平常人只要通过学习明理，完全有可能成为君子。君子与仁人都是品德高尚的人。两者的最大差别，仁人都是君子，而君子未必都是仁人。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（39）君子不是完人，有时也会犯错误，做一些不符合“仁”的标准的事情，但是君子的内涵中还是有“仁”，而“小人”的内涵中不可能有“仁”的存在。用逻辑的方法分析，“仁人”与“君子”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包含关系，仁人是君子中的精英，而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这两个关系是反对关系，“小人”与“仁”不沾边。

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的终极目标，就是希望平常人都能成为君子，整个社会当然就祥和、稳定。他希望学者不仅成为儒者，更要成为君子；这种具有君子品德的学者，叫做“君子儒”。子夏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，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。孔子希望他能德才双馨，曾告诫他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（40）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，不在才艺高下，而在道德品性的有无。以做学问而言，是为提高自己，不是为取悦他人或傲睨他人。孔子讲“君子”，《论语》中记有数十处，涉及如何做“君子”、“君子”的基本品性等诸多问题，举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“好德”。孔子所讲的“德”，与老聃讲的“惟道是从”的事物特有属性或规律的“德”不同。孔子所讲的“德”，又回到了周代统治者的“敬德”之德，是伦理意义上的个人品性修养，与他主张“克己复礼”相一致。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没有老聃那种“上德”、“下德”、“玄德”的分类；在他看来，德就是德，德有大小之分，没有上下之别。德是人们经过不断的品性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。孔子认为，人们应该象喜欢美色一样地喜欢“德”；有了这种喜欢之心，才有追求的行动。孔子曾有“食、色，性也”之语。对“色”的喜欢，是人发自内心的固有之性；对“德”的喜欢，也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如同喜欢美貌一样的喜欢美德的人却很少见。以致孔子作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（41）这一句充满绝望情绪的感叹，反映了春秋末期的社会风尚，确实到了礼崩乐坏的境地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

版权所有：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©2003-2007